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杏坛忆旧

XINGTAN YIJIU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杏坛忆旧/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1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ISBN 7-200-03994-2

I. 杏… II. 北… III. ①教育史-史料-北京②医学史-史料-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232 号

杏坛忆旧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选 编: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 刘东升

杨良志

装帧设计: 朱 云

责任印制: 李文宗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社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电话: 总机 (010) 62016699

邮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00-03994-2/K·406

定 价: 2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	顾颉刚 (1)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萧 劳 (8)
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	蒋善国 (13)
我和胡适的交往·····	贺 麟 (17)
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 (24)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 ·····	《陆志韦传》编写小组 (40)
焦菊隐先生在师大·····	徐 康 (70)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	雷洁琼 (85)
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胡传揆 (88)
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 ·····	邓家栋 (100)
我的母校协和医学院 ·····	严镜清 (110)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	叶恭绍 (117)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	吴阶平 (126)
协和医学院的护士学校 ·····	聂毓禅 (138)
同泽新民储才馆 ·····	李荫春 (149)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	刘万春 (163)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	姜明文 (170)
两所中央警官学校的由来 ·····	许兆林 (182)

- 爱国职业教育家费起鹤 费路路 (187)
-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杨崇瑞校长 傅 惠 (198)
- 北京一中 李寿朋 闵孝慈 (211)
- 北京市第二中学 北京二中 1983 届文科班 (228)
- 从大中公学到二十二中 爱新觉罗·溥筠 (243)
- 慕贞女校 马 燕 (254)
- 百十周年庆汇文 王振乾 (268)
- 贝满女中 李爽麟 蒋 雯 (306)
- 毕生致力于中学教育的管叶羽校长
..... 黄亦平 李爽麟 (329)
- 北京育英学校 王宝初 (347)
- 通县私立潞河中学 陈昌祐 刘汝英 (362)
- 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 钱秉雄 (373)
- 回忆今是中学 张廉瀛 (389)
- 北京私立崇德中学 李瑞启 (394)
- 从金台书院到东晓市小学 陈德光 (408)
- 静宜园与香山慈幼院 禹金孝 (418)
- 从事体育教育六十五年 夏 翔 (455)
- 清代的太医院 赵绍琴 (468)
- 北京四大名医 谢海洲 (477)
- 先师孔伯华先生 马龙伯 (485)
- 回忆外公施今墨 祝肇刚 (501)
- 中医药材学的奠基人赵燏黄 洪 波 朱 晟 (518)
- 儿科专家诸福棠 肖 集 (525)

围棋技艺的发展	过惕生 (538)
北京棋坛风云录	马 珍 (553)
先农坛体育场	戴式增 (562)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

顾颉刚

我 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 年又考入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 1920 年才毕业。1919 年 5 月 4 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 1919 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 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 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

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 5000 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所谓“结十兄弟”，就是 10 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 9 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 10 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学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 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

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过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科，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

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是“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

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五千多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

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领干股的咨议顾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1979年出版）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萧 劳

蔡元培校长一事

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当时我的名字是萧稟原。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时我是一个学生，和蔡先生接触不多，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领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风度。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

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陈独秀学长二事

陈独秀先生那时任文科学长，他不仅是提倡新思想、新文学的一位领导人物，而且对文科教学工作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两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

我考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后，上英文课，当时英文教学按试卷分数编成甲、乙、丙、丁、戊五班，我被编到乙班。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个中国字不说。我是在河南省立二中学的英文，虽然文法清楚，英文字认得也不少，但听力不行，对英国教授讲课一点也听不懂，便不去上课了。过了一个星期，陈独秀突然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你为什么不不去上英文课？”我说：“听不懂。”陈先生说：“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绩很好，怎么会听不懂呢？”我说：“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只能写，不能说。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说得太快，我听不懂。”陈先生便说：“那你就退到丙班吧，还听中国老师讲课。”后来我就在丙班上课了。

中国文学门是由黄侃先生讲授古文。第一天上课就出了个《文心雕龙》上的题目，叫学生作文。我刚写了一百多字，黄先生看见了说：“好！”便拿到讲台上念了一遍。有一天下午上课，我精神有点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说：“我讲书，你睡觉！”我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先生怒气未息，说：“不愿意

听就下去嘛！”我一负气就出去了，接连两个星期没上黄先生的课。又是陈独秀学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了，问我为什么不上课。我陈述了以上情况。陈先生说：“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行呢？”我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先生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送进教室，正好黄先生在讲课。陈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黄先生也没有说话，陈先生才离开教室。从此我就恢复上古文课了。

钱玄同先生一事

钱玄同先生那时讲授文字音韵学。他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很受同学尊敬。有一次，钱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广东音韵，课后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提出了不同意见。下一次上课时，钱先生上台后面带笑容，客气地问：“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李锡予站起来回答说：“我就是。”钱先生说：“请坐！我见到你的信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我的纰漏。”接着，钱先生在课堂读了李锡予同学的信，还希望其他同学对讲课中纰漏之处提出意见。从这件小事，可见钱先生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

黄侃先生三事

黄侃先生当时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龙》，他对古典文学有相当深的造诣。他是“国故派”的一位首领，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

白绸带。有一次他过生日，几位中国文学门的学生登门拜寿，其中有位陈莲痕同学是我的好友。他们进门后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先生勃然大怒，说：“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当时吓得这几位同学只好磕头。

黄先生最喜爱的一位学生叫郑奠，常常给黄侃先生拿皮包。后来郑奠毕业了也在北大任教。有一天，黄节先生（北大讲授诗词的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先生和郑奠二人都去了。黄侃先生看见郑奠穿着一件皮袍，大为不悦，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郑奠说：“我穿我的皮袍，你管不着我。”黄侃先生听了很生气，从此不理郑奠了。

黄侃先生的脾气古怪，他本来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不知什么缘故和这位朋友闹翻了，搬走的时候，用毛笔蘸浓墨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带“鬼”字旁的大字。众人看见满壁皆“鬼”，黄先生才得意而去。

罗家伦二事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个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他追逐名利慕权势，当时就为同学所不齿。我记得五四游行后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礼堂的学生集会上，罗家伦大肆吹嘘自己，引起与会同学不满，说他“沽名钓誉”、“风头主义”。一位同学就走上 去把他推下了讲台。罗家伦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却暗中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段祺瑞的宴会。有些北大同学得知此事，画了一幅罗在宴会上拿着刀叉吃大菜（西餐）的像，加了注解，贴在北大西斋壁报栏上。同学们看了都很气愤。有位同学写了四句打油诗讽刺罗：“一身猪狗熊，两眼官

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意指无耻）。”这四句打油诗在北大广传一时。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徐康 整理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1985年出版）